

燕秦汉辽东长城形制考古调查研究^{*}

李树林¹ 贾云章²

(1. 通化师范学院燕秦汉辽东长城研究中心, 通化, 134002;

2. 通化师范学院图书馆, 通化, 134002)

据大量中国史籍文献记载, 战国燕、秦、西汉相继在辽东地区修筑过长城(下文简称辽东长城)。如《史记·匈奴列传》载:“燕亦筑长城, 自造阳至襄平。”《史记·蒙恬列传》载, 秦长城“因地形, 用险制塞, 起临洮, 至辽东, 延袤万余里”。《汉书·赵充国传》亦载, 汉长城“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其中《史记·朝鲜列传》所载的“自始全燕时, 尝略属真番、朝鲜, 为置吏, 筑障塞。秦灭燕, 属辽东外徼。汉兴, 为其远, 难守, 复修辽东故塞, 至溟水为界”这段话, 明确表述汉“辽东故塞”是在燕秦长城基础上复修的线型障塞体。自20世纪40年代初, 考古学家李文信、佟柱臣两位先生就已开始对辽西古长城进行调查, 近30年间, 中、朝两国辽东长城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2007~2012年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工作结束, 学者们对长城形制见解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我们理解, 长城形制, 应包括设施构成、修筑形式和布局模式等主要方面。那么辽东长城主体设施由哪几类考古遗迹构成? 形制是单一结构、双重结构还是多元结构? 存有哪些设置与布局模式? 下面, 我们结合20余年田野考古调查实践与“中国障塞长城学”理论研究探索, 试对这些问题进行首次的全面解析, 并诤教于诸位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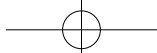
一、中外学界有关辽东长城形制问题的学术见解

世上任何一项重大考古发现, 都要经历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由量变到质变的曲折漫长认知过程。中外学界曾就辽东长城形制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 有四种主要观点:

(1) 燕辽东长城“略似后世东北边墙”。1991年, 吉林师范学院薛虹、李澍田教授主编的《中国东北通史》中提出:“战国末期, 燕国强盛时, 为防朝鲜和真番, 修筑了障塞。障塞比长城规模小, 略似后世(明代)东北边墙。”^[1]可称之为“长垣结构”说。

(2) “秦辽东外徼是设于长城的国境‘设施’。”1979年出版的《朝鲜全史》第2卷提出:“前214年秦筑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在长城以东设辽东外徼。辽东外徼是设于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批准号: 13BKG020)。



长城的国境‘设施’，在长城东部不远的地区。”^[2]可称之为“城徽结构”说。

(3) 汉辽东长城为“列隧”性质。1992年，考古学家孙守道先生根据沈、抚浑河北岸发现的数十墩烽燧，提出汉代辽东长城为“列隧”性质^[3]；1999年，抚顺市博物馆专家在境内新发现40余墩烽燧后认为，“汉辽东长城的今抚顺部分甚至有可能并无墙体，而只是由这些连续的烽台即‘列燧’组成”^[4]；2010年，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工作队负责人向媒体宣布：“我省境内的长城遗址，包括辽宁境内的长城遗址，更确切地说，应是烽燧性质的长城。”^[5]可称之为“列燧结构”说。

(4) 汉长城为“城燧”结构。2012年，吉林省文化厅对媒体宣布：“吉林省汉长城分布在通化县境内，向西与辽宁境内的汉长城连为一体。调查结果表明，通化县赤柏松古城既是汉长城防御体系的重点与核心，也是汉长城的终端。吉林境内的汉长城以2座城址和12座烽火台构成防御体系。”^[6]“吉林省发现的长城遗址……并不像人们所常见的北京八达岭那样是有城墙的长城，具有防御和界限的功能。”^[7]可称之为“城燧结构”说。

上述有关辽东长城形制的诸说，其中不乏文献推论、主观臆测、局部认识和人云亦云的现象。目前，中外学界对辽东长城的研究正处于由初步探索阶段到深度研究阶段的转型时期，难免存在一些局限的、片面的，甚至荒谬的认识。我们认为，要科学准确的解析辽东长城形制问题，需做到如下三点：一是要拓宽调查新视野。只有对整个辽东长城进行全面系统的田野调查，才能占有最完整的考古学资料，最终获得科学的结论。任何局部的认识都如同“一叶障目”，极易导致对整体的错误判断；二是要讲求调研新方法。除了依靠传统的田野考古学调查法、史料归类法、史学“二重证据法”外，还要创新专门的障塞长城考古学调研方法（如试点调查和对比研究），注重考古哲学思维，提倡跨学科交叉研究；三是要提升理论新境界。调查研究既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又不能墨守成规，故步自封，要富有创新意识，解放思想，挣脱传统观念束缚，不盲目崇信权威性结论，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升华对中国障塞长城学的理论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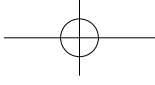
二、田野调查发现的辽东长城构筑类型与形式

调查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研究则是调查的发展与深化。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通过事物的现象揭示其本质。我们经过20余年的全面调查与系统研究，发现自阜新大凌河支流忙牛河（考为古辽东、辽西郡界）以东的辽东千里长城线上，由两种主体构筑类型和一种附属类型，即“2+1”要素构成，并存在三种构筑形式。

（一）“主体+附属”构筑类型

1. 主体性军事类设施

辽东长城功用之一，是建立防御诸侯列国争伐（指战国燕北长城，曾防御箕氏朝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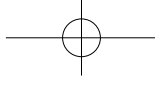
侯国和“东保辽东”御秦统一战争)、防范北方与辽东诸族侵扰的军事基地。包括墙体、堑壕(与墙体设在一起)、烽燧、望堠(或称斥堠,设在烽燧附近)、山障、城堡、关隘等,这些用于阻截冲击、观察守望、燃燔报警、屯兵驻守、扼控要塞的障塞据点,占有绝对数量,是构成辽东长城的主体。据我们最新统计,目前在辽东长城线上已发现此类障塞设施 360 余座(墩、处、道)^[8]。但辽西段、辽东段长城在障塞设置上稍有差别,除都有烽堠、山障、关堡等设施外,阜新县境“燕北内长城”(又称南线长城)、“燕北外长城”(又称北线长城)两线上,已发现 30 余道墙体(平原上多土或土石混筑、山脊线上石筑),少见关隘遗存^[9];而沈阳、抚顺、通化至集安间路线,已发现 20 余道关隘址,但障塞间尚未发现墙体^[10]。这是由于两地防御对象不同(辽西北防东胡、匈奴、乌桓等游牧民族,辽东扼控濊貊、夫余、高句丽等渔猎民族)、所经地理形势不同(辽西为低山漫岗丘陵、辽中为辽河冲积平原,辽东为长白山地高山深谷)所致。这些军事设施的考古发现,佐证了《汉书·赵充国传》所载“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校联不绝,便兵弩,飭斗具,烽火幸通”的设防实情。

2. 中枢性行政类城址

辽东长城功用之二,是建立中央集权统辖下的地方行政机构,包括都城、王城(燕、代“东保辽东”后置)、郡城、尉城、县城和特设的少数民族“贡城”。调查发现此类城址其两翼及外侧障塞群拱卫,是长城线上重点防御的“大脑中枢”。其特点是规模较大(周长超千米、特大型周长达 2500 米),构筑坚固(普遍设有护城壕、角台、烽堠、马面等),有大型建筑台基(周边存有大量绳纹、布纹、菱形纹、方格纹板瓦与筒瓦构件,多见“千秋万岁”等铭文瓦当与云纹瓦当),遗物丰富(有剑、矛、戈、镞等战国晚期青铜兵器,大量燕布、刀币,秦“半两”、西汉“五铢”、东汉“货泉”等货币,多现铁制兵器和生产工具,夹砂红褐陶、细绳纹灰陶或素面灰陶器物),周围有大量墓葬群分布。现已在辽东长城线上共发现此类城址 31 座^[11]。这些大型城址的考古发现说明,燕秦汉政权将边郡边县设置在长城线上,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边塞地带的统治力量和护卫要城安全需要,印证了《史记·朝鲜列传》所载“为置吏,筑障塞”“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的根本目的。

3. 附属性保障类遗址

辽东长城功用之三,是“开郡治边”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屯田渔猎、铜铁采掘与冶铸、建材陶器烧制等生产性遗址,实行“徙民实边”政策而形成的古村落、古窖藏、古墓葬群等生活性遗址,修筑长城驰道(含关津哨卡)、通川之道^[12]而形成的交通网络。现已在长城线及长城地带发现此类遗址 240 余处(座、条)。如,我们确认的通化县窑上、西岗、金斗、杨宝沟、八尺庙、湾湾川龙岗等屯田址(出土大量石质及少量铁质生产工具);通化县小都岭遗址、通化市王八脖子遗址、临江市夹心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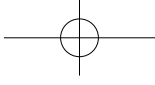


古铜矿、临江古铜矿^[13]、辽阳县太平沟铁矿、牌路沟铁矿等铜铁采掘、冶铸址^[14]；考古发掘揭露的辽阳市三道壕^[15]、抚顺市莲花堡^[16]、通化市拉拉屯和^[17]朝鲜平安北道博川郡坛山里^[18]等地的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大、中型村落址；根据《居延汉简》所出简牍文书“及赍乘传者……玄免（菟）乐狼（浪）至旁近郡以县厩置驿骑行”^[19]记载，可知汉代万里长城驰道，已达辽东诸郡。我们在新宾县上夹河镇古楼村、通化县三棵榆树镇和石湖镇、通化市二道沟、集安市凉水、长白县十二道湾等地均发现了长城古道遗迹。这些保障性附属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长城自身拥有庞大的后勤保障供应体系，验证了《汉书·晁错传》所载的“募民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历史事实。

（二）三种构筑形式

I式：“点线式”障塞结构，是指由军事类障塞设施和行政类大型城址连缀构成的长城形式，其最大特点是各据点、城址之间没有发现墙体连接。此式主要分布在辽河以东地区。如我们确认的铁岭县辽河西岸→（箭头方向表示长城方位走向，下同）东岸邱台城址↓沈北东部丘陵↙沈阳→抚顺浑河中游→新宾苏子河两岸→通化县→通化市浑江中游↓大罗圈沟河两岸↙通沟河谷两岸↘集安↗临江→长白县城鸭绿江中上游右岸地带的障塞线，长度超过900千米。在沈阳市东陵区青桩子城址↓抚顺县拉古↓海浪乡一线^[20]，已发现障塞实体长约40千米（我们推测此线达辽阳，非本溪、丹东方向，为一支线）；在丹东凤城刘家堡城址↘丹东市绥河尖城址间发现长约50千米障塞线；我们还注意到，在朝鲜大宁江燕长城线（朝鲜学者称长城城脉）东侧20~800米还存在一条障塞线，南越清川江经顺川市慈母山城↓平壤大同江↙龙冈大同江口，长约230千米，由较多中小型军事障堡、关隘（朝鲜学者称阻截城）、烽堠（朝鲜学者称瞭望台），以及若干座大型行政城址（如博陵城、慈母山城、平壤市大同江畔“乐浪郡”治土城洞城址等）构成^[21]。推测当为《史记朝鲜列传》记载的“复修辽东故塞”沿用秦长城之“碣石”线。据我们统计，目前发现障塞线总长度超过1300千米，是辽东长城的主要构筑形式。

II式：“线条式”长垣结构，是指基本上由一条连续的长垣墙体所构成的长城形式，在主线长城（朝鲜学者称主体长城）和支线长城（朝鲜学者称辅助长城）墙体上，设有军事类障塞设施和行政类大型城址，其构筑特点是在“点线式”各障塞据点之间连接长垣，此式主要分布在朝鲜西北和辽西地区。朝鲜平安北道“大宁江长城”，北近鸭绿江，南至清川江入海口，全长120千米。其修筑特点“在江边辽阔的平原地带，便更多利用泥土与石头的混合（墙体）。从东仓郡的新安里六班（城兴洞）到里所在地附近，以及新安川北部——昌城江东侧山麓、麓城里的江东山麓、鹤峰里和阳地里的部分地区，还有丰林里的山区，至今尚残存着一些石头城墙。……在博川郡的中南里、宁边郡的古



城里、泰川郡的鹤塘里等平原开阔、石头稀少的地带，主要是用土或土石混合进行筑城。……像德化里和鹤塘里一带以及中南里的部分区间，江岸即是绝壁，城墙只是修到岸边，崖顶便不再构筑城墙。”^[22]2014 年秋，李树林教授在鸭绿江左岸的朝鲜慈江道慈城郡远洞里（江对岸为中国临江市苇沙河镇）发现一条长 12.8 千米的墙体，墙体上存有门址 3 处、烽燧址 7 墩、障亭址 3 座、城堡址 3 座；同年春在阜新县八家子山北坡、阜新镇南山北坡发现了长度超过 5 千米的土筑长城墙体（内为堑壕）；在沙拉镇二郎山西北半山腰也发现了上、中、下三道并行环山土筑墙体（内为堑壕），长度超过 6 千米；在法库县叶茂台北山北坡新发现了长 400 余米的土筑墙体（内为堑壕）和一墩土筑烽燧址^[23]；此前考古工作者在叶茂台西山西北坡、北山北坡发现长约 2 千米的土筑和石筑墙体^[24]；在阜新县紫都台乡李家沟屯西北发现一段数千米长的石筑墙体等^[25]。据我们初步统计，目前发现此式结构总长度约 250 千米，是辽东长城的辅助构筑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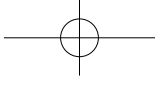
Ⅲ式：“线段式”短垣结构，是指由时断时续、走向一致的防御性短垣墙体，连接军事类障塞设施和行政类大型城址所构成的长城形式，如同一条条长短不一的线段。此式主要分布在辽西地区，如阜新县“燕北外长城”线上的套尺营子、八间房“黑土垅”等墙体和五墩烽燧、四座城址^[26]；本课题组在虎掌沟西山东南坡发现上、中、下三道总长约 2 千米的环山墙堑；“燕北内长城”线上的红帽子乡蒙古四家子（土筑）、阜新镇小朝阳沟东山（石筑）、衙门营子北山（石筑）、高林台村北村南（土筑）、阜新镇东南山、张家洼子、大巴镇道不代村北山、杜代营子村南山根、后朝阳北大山山脊上 4 段墙体（含我们新发现的 2 段墙体）、老河土乡阿拉乌束、英桃莫、好不代、泡子镇田家、一家子障亭址东南等地均发现了长度从几十米至三四百米不等的墙体^[27]。2014 年秋，李树林教授在鸭绿江右岸的临江市六道沟镇桦皮甸子城堡北侧、七道沟村江岸，长白县十四道沟镇十四道沟城堡东西两侧江岸，还有鸭绿江左岸的朝鲜慈江道中江郡土城里，两江道金亨稷郡中章洞，金贞淑郡丰阳里等地，新发现了长度 300 ~ 2000 余米的墙体。据我们初步统计，目前的此式结构总长度 150 余千米，是辽东长城区段最少的构筑形式。

三、辽东长城障塞设置的特定规律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从现象到本质、充满矛盾的辩证过程。调研中我们发现，辽东长城障塞设施纷繁复杂，但在空间设置上有着特定的规律，存有“一个基本、四种组合、四种特殊”的制塞模式，从而构成一道十分完备科学的庞大线型防御体系。

（一）障塞设置的一个基本模式

《居延汉简》是 20 世纪 30 年代发现于西北地区汉代长城障塞遗址的档案，出土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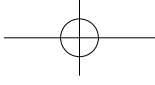


牍文书中记有“五里一燧,十里一墩(“障”之笔误),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28]字样,可认定为中国障塞长城设置的最基本模式。我们通过多年反复田野验证发现,此布局只是障塞长城空间设置的基本模式和理论概数,不是绝对数,实际上障塞设置距离远近与配备组合是要根据实际地形特点和守备功用、兵力配属的需要来确定。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里和现在的里长度有所不同。《中国度量衡史》云,“周、秦、汉之制,均以六尺为步”,汉尺合 23.04 公分,合今尺为 0.6912 寸,六尺为一步,300 步为一里,一汉里则相当于现代的 414.72 米^[29]。就是说汉长城平均每间隔约 2.5 千米就设有一墩烽燧,每间隔约 10 千米就设有一座山障候城,每间隔约 15 千米便设有一座关堡隘卡,每远隔约 42 千米必设有一座大型行政类城址。据我们最新统计,从沈阳市浑河北岸到集安市区鸭绿江畔间 400 多千米长的障塞线上,已发现烽墩址 100 余墩、山障址 14 座、关堡址 7 座、关隘址 7 道、大型行政类城址 13 座。阜新“燕北内长城”124 千米长的路线上,已发现烽燧址 54 墩、山障址 12 座、关堡址 2 座、大型行政类城址 1 座。抚顺、通化、阜新一地的长城障塞设置标准密度为 2.5~3 千米。考古调查事实证明,辽东长城障塞的空间设置完全符合此基本模式。

(二) 障塞设置的四种组合模式

1. 郡县组合

郡城址附近的障塞线上必设有两座县城址,即“县城+郡城+县城”三城模式,便于边郡对属县行政统辖和相互军事策应。此式只适用于两汉玄菟郡“初四县”(公元前 108 年置沃沮、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县)、“前三县”(公元前 82 年玄菟郡内迁后存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县)和“后三县”(公元 107 年由辽东郡划拨高显、候城、辽阳三县)设置组合。我们在沈阳—长白“真番障塞”线上确认五组“郡县三城模式”^[30]: A 组为白山三道沟汉城^[31](考为西盖马县首治)、集安良民汉城^[32](考为玄菟郡首治沃沮城)与集安市区高句丽石城下汉城址^[33](考为上殷台县首治); B 组为通化市治安山城^[34](考为玄菟郡三治及一属县治)与平岗山汉城^[35](考为上殷台县或西盖马县二治)、通化县赤柏松汉城址^[36](考为玄菟郡二治高句丽县首治); C 组为新宾县永陵二道河子汉城^[37](考为玄菟郡四治“玄菟故府”及一属县)、苏子河畔汉城^[38](考为高句丽县二治)、白旗堡汉城址^[39](考为上殷台县或西盖马县三治); D 组为抚顺市劳动公园汉城^[40](考为玄菟郡五治及一属县)与高尔山西汉城^[41](考为候城县)、东洲汉城址^[42](考为高句丽县三治); E 组为沈阳上伯官屯汉城^[43](考为玄菟郡六治及一属县)、青桩子汉城址^[44](考为高显县二治)与沈阳路汉城址^[45](考为辽阳县治)。考古调研成果表明,这五组“郡县三城”模式,是两汉玄菟郡因貂夷、高句丽政权侵逼频繁西迁、长城线不断内缩的历史见证。



2. 城障（候）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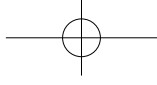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郡县城两翼必设有候卫性质的障城 2 座，即“障城 + 郡县城 + 障城”模式。这样设置，有利于拱卫郡县城安全。如通化市治安山城东有二道江桦树河口障城^[46]，南有王八脖子障亭址^[47]；通化县赤柏松汉城东北有平顶山障城，东有黎明北山障城^[48]；长白县长白战国西汉城址^[49]（考为燕真番城、西汉真番郡治雪县）西有十四道沟关堡，东有马鹿沟北山障堠^[50]；阜新县燕北内长城线上高林台汉城（考为辽东郡西部都尉治无虑县），西有华东街道奶牛场四分场候城址，东有阿金歹六队候城址^[51]；丹东市绥河尖城址（辽东郡西安平县）^[52]，北有楼房镇石城村老古城山障候^[53]，东有宽甸县虎山障堡址（汉代始筑，高句丽、明代复筑）^[54]等。李树林教授新发现在朝鲜慈江道中江郡非古洞山城（周长 1395 米）西侧山脊线上或山冈顶部筑有 5 墩排列有序的微型障城，在山城东部临江平原上还有一座小型障城。

3. 障亭组合

障城左右两线必设有烽燧望堠设施（史称“障亭”），即“烽堠 + 烽堠 + 障（候）城 + 烽堠 + 烽堠”模式，从而构成以“候官”（驻守障城）为军事防御单位的若干个防区。如通化县金斗乡砬缝村八岔沟烽堠 + 小西沟烽燧 + 大南沟障堠 + 河夹信烽堠 + 快大茂镇三合堡烽堠 + 平顶山障城 + 赤柏松城址 + 大茂山烽堠 + 大茂山南砬头烽堠 + 黎明北山障城 + 黎明东山烽堠 + 湾湾川障堡^[55]，新宾县上夹河镇河西烽堠 + 关山障亭 + 古楼迎风阁障城 + 古楼天桥岭障候 + 胜利龙头山障亭 + 腰站烽堠 + 上夹河烽堠^[56] 阜新县“燕北内长城”东段障塞线上的大巴镇杜代营子南山烽燧 + 北大山西南列燧（已发现 3 墩） + 北大山西南障城 + 北大山东北障城 + 北大山东北“列燧”线^[57]；我们新发现的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屯障城 + 什洋水库山顶烽堠 + 马刚乡董楼子障城 + 铁营子障城 + 铁岭县懿路烽燧（明墩下发现战国刀币）障塞线亦如此。

4. 关塞组合

关城（大者称城、小城为堡）与关隘设施组合，即“关城（堡）+ 关隘”模式。这样设置，目的是强化郡县和要塞区军事防御能力。如阜新县大五家镇西营子候城（周长约 440 米），在城址的西、北侧约 50 米处存有长城墙体，附近发现多座烽燧址与障城址^[58]；集安良民城址（周长约 1300 余米）东北秋皮砬头，筑有一段长 550~600 米许的石墙；与之西距约 10 千米处的青石镇下双安关城（新测周长 558 米）亦附设 50 余米长的关墙^[59]，系扼控良民郡城的北、西向交通门户；长白县十四道沟关堡（周长 120 米）附属长达 500 米关隘（新测周长 696 米）^[60]，为扼控长白古城鸭绿江右岸古道要冲的西部门户；新宾县木奇、上夹河两镇之间山岭上所谓“建州三关”之间发现 5 墩汉代列燧，且与长城线连成一线，守护着永陵南 2 座大型郡县城址^[61]。李树林教授在鸭



绿江左岸朝鲜慈江道慈城郡土城里发现一座微型方形关城,城址东侧露出云峰水库水面的南北走向关墙长 302 米。

(三) 障塞设置的四种特殊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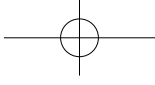
汉魏史籍文献中载有多种长城“列塞”专用词语。《太玄·玄摛》注曰:“列,序也。”横排东西向谓“列”,“列”也表示数量多、连续排列之意。调查发现,辽东长城上同样分布着一些特殊形制的“列塞”模式。

1. 列燧(亭)

《汉书·赵充国传》载,“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史记·大宛列传》云:“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列亭,即列燧别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已在浑河中游及上游支流苏子河两岸发现 70 余墩“列燧”(我们最新统计为 84 墩)^[62];我们在吉林省通化浑江中游已发现狍圈沟等 20 余墩“列燧”,在鸭绿江左岸的朝鲜两江道慈城郡远洞里长城线上新发现 8 墩“列燧”,考为《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所载的“莽曰玄菟亭”;在铁岭市辽河两岸自东北向西南一线,分布大台山、杜蒋窝棚龙湾山、清辽村南台(开原市)、陈平 4 墩“列燧”^[63];阜新县“燕北内长城”线中东段发现八家子山顶、高林台北山和东山、杨家荒村西等 9 座烽燧,大巴镇北大山山脊线上连续分布 12 墩烽燧^[64]。从沈阳青桩子城址—拉古—海浪障塞线,连续设有蔡家沟东北山等 22 墩烽燧址^[65]。

2. 列障(堡)

《史记·大宛列传》载有从玉门以西筑“列亭障至盐泽(今罗布泊)”和“行坏光禄诸亭障”等字样。《史记·正义》顾胤云解释为:“障,山中小城。”在新宾县上夹河镇苏子河下游近 10 千米长的两岸,分布有古楼村河西关山、迎风阁北山、天桥岭东山和胜利村龙头山 4 座微型、小型和中型规模的山障(采集铁镞、泥质绳纹灰陶残片)^[66];通化县三棵榆树镇三棵榆树河两岸 6 千米的范围内自西南向东北连续分布北岗西台、南台、太平沟门、依木树 4 座平地城堡,都相距 2.5 千米左右^[67];临江市六道沟镇鸭绿江右岸长约 20 千米的障塞线上,连续分布东马鹿、夹皮沟、桦皮甸子三座障堡^[68](高句丽、渤海沿用),而李树林教授新发现在江对岸朝鲜两江道金亨稷郡沿江地带,连续分布有葛田洞 1、2 号障城址,沼洞障城址和金昌里山城址,河山堡山障和河山堡等 6 座城址,使这一区段的沿江列障(堡)数量达到 9 座;在阜新县“燕北内长城”西段长约 20 千米线上发现的“列障(堡)”有化石戈乡上新邱 1、2 号障亭址、下新邱障城址、郝家窝堡南障城和东障候、杖房屯障城、紫都台乡南昌营子障城、北沟西障城和北屯沟障城址,大五家子镇后窝堡障城、西营子城堡等 10 余座障堡^[69]。这些区段“列障



(堡)”具有共性特点，都远离郡县城址系为加强防御薄弱环节所筑。

3. 列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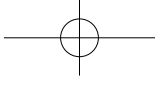
包括军事性列城和行政性城址。《春秋·成公十五年》载：“楚盛周衰，（庄公）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军事性城址）于北方，以逼华夏。”《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行政性城址），河上为塞。”《汉书·武帝纪》所载的“三年夏，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则确指军事性镇城、障城、关堡城址。据我们统计，自辽阳（辽东郡治襄平城）经沈阳、东达通化、集安至长白县城（含鸭绿江对岸朝鲜一侧）约 900 余千米长的障塞线上，已发现了 21 座大型行政类城址、60 余座军事类障城关堡^[70]。在朝鲜平安北道大宁江长城线上，以博川郡博陵城为中心，分布有中南里老奴城和德岭山城、大宁里黑碑城、青山里古城镇土城、云坛里小城等 6 座障候城址^[71]。在距大宁江长城东侧 20~800 米障塞线上，连续分布东仓郡鹤松里堂阿山城，秦川郡鹤塘里延上里山城、丰林里山城、龙兴里攄武山城和龙吾里山城等 5 座障城址^[72]。这些城址中多为军事性障堡，同属“列城”布局。

4. 列隘（关）

是指在长城线古道上的山谷隘口、江河要津等处连续设置的多道扼控交通门户的关隘类设施。《辞源》释义，“关：关口、关门。古设关于界上，以稽查行旅。”高诱注：“关，要塞也。”新宾县苏子河中游东西不到 7 千米范围内，连续筑有“雅尔哈关”“代珉关”“扎喀关”三道关隘墙体^[73]，是中原进出辽东的第一道门户；在通化境内老岭山脉南北长约 60 千米的沟谷古道隘口处，自北向南相继筑有通化市鸭园镇二道沟门关隘^[74]、通化县石湖镇关隘^[75]、集安市青石镇下双安关城、黄柏关隘^[76]。在集安“国内城”下土城至丹东暖河尖城址的鸭绿江右岸古道上，已发现 10 余道关隘址，如集安市凉水乡“老边墙”“七个顶子”关隘^[77]，宽甸县振江镇浑江口关隘和下露河乡通江村关隘，大西岔乡大白菜地村“老边墙”（边墙两端山顶设有二墩烽燧），红石镇大泉眼屯“头道边墙”、二泉眼屯“二道边墙”、龙井屯“三道边墙”、中蒿子沟村“头道边墙”、周家堡子“二道边墙”（边墙北端山顶设有烽燧）至古楼子乡大古岭村甸心子边墙。此外，在红石镇腰岭子村发现的车道岭“头道边墙”、西下洼屯“二道边墙”和高家堡子“三道边墙”^[78]，系扼守南北进出鸭绿江的关津要冲，隔江与朝鲜昌城江、大宁江长城相接。这些“列隘”既有长城线上的关隘设施，也有沿江驰道上的关津哨卡。

四、结 论

上述相对全面系统的田野考古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辽东长城的形制结构非常复杂，既非“列燧”单一结构，也不是“城徽”或“城燧”双重结构，而是内涵丰富、设



置独特的多重障塞结构。其中“通化县赤柏松古城既是汉长城防御体系的重点与核心,也是汉长城的终端”“士兵依据的天险可能就是一块孤立的石头,就近拢一些火,放狼烟传递信息”等认识,既与史籍文献相佐也和田野调查相悖,是一种主观臆测,是完全错误的,需要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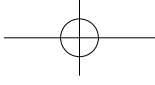
辽东长城的障塞设施,由主体性军事类设施、中枢性行政类城址以及附属性保障类遗址即“2+1”构筑类型构成;总体上遵循“因地形用险制塞”原则,或“因河为塞”或“因边山险”或“因山置障”或“因谷为封”;在障塞设置上独具匠心,根据不同的地理形势需要分别采用“点线式”障塞结构、“线条式”长垣结构和“线段式”短垣结构三种构筑形式;在空间布局上存有“一个基本、四种组合、四种特殊”的制塞模式;这种富有鲜明时代特色和独特文化体系的障塞长城,凝聚了中华古代民族的伟大创造和高度智慧,堪称中国早期长城的典范,对后世长城建筑理念和形制结构影响巨大。

比较明代长城而言,燕秦汉辽东长城的修筑具有相对简易、工程量小、工期较短等优点,障塞之间无墙或少墙,处于完全开放或半开放状态,只有个别地段完全封闭,缺点是据守难度大(亦是在东汉时期屡被匈奴、高句丽等边夷诸族所破失守的重要因素);而明代墙垣长城则构筑相对复杂、工程巨大、工期漫长等缺点,处于完全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仅有个别地段则完全开放,优点是易于据守。

需要强调的是,辽东长城并不是以往学界认识的单纯军事防御工程,而是具有行政统辖、经济兴边、社会发展、文化传播等“多能一体”的历史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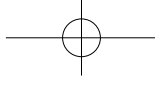
注 释

- [1] 薛虹,李澍田:中国东北通史[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 [2] 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全史·第二卷古代篇[M]. 平壤,1979.
- [3] 孙守道:汉代辽东长城列燧遗迹考[J]. 辽海文物学刊,1992(2).
- [4] 抚顺新发现40余座汉代烽台[N]. 人民日报,1999-10-15.
- [5] [7] 秦汉长城东端起点调查获新发现 界定为吉林通化[N]. 中国新闻网,2010-6-4.
- [6] 吉林省内有3处长城遗迹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N]. 中国新闻网,2012-6-7.
- [8] 李树林,李妍: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城址量化统计分析[J]. 北方文物,2011(2). 近年调查有新发现,统计数量在原有基础上大幅增加。
- [9] 吉昌盛,王久贵,等:辽宁省阜新市、区阜新县燕秦汉内线(南线)长城考古调查情况纪实[A]. 辽宁长城(五)[Z]. 沈阳,2006:50-52.(内部资料)
- [10] a. 王文:自费调查研究二十载:李树林提出辽东障塞长城新见解[N]. 中国文物报,2011-5-4.
b. 李树林,李妍:吉林省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群考古调查简述[J]. 社会科学战线,2011(10).
- [11] 李树林教授根据现已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考古调查资料,并通过对部分城址实地调查研究后确认,这31座大型行政类城址自西向东、由北向南排序是:辽宁省阜新县高林台城址;铁岭县邱台城址;沈阳市沈北新区全胜堡城址;沈阳市沈河区宫后里城址;沈阳市东陵区上伯官屯城址;沈阳东陵区青桩子城址;抚顺市劳动公园城址;抚顺市高尔山城西城;抚顺市东洲城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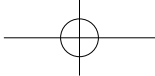
新宾县永陵苏子河城址（北城）；新宾县永陵二道河子城址（南城）；新宾县红升乡白旗堡城址；吉林省通化县赤柏松山城；通化市治安山城；通化市平岗山城；集安市区“国内城”下土城；集安市良民城址；白山市三道沟镇城址；临江市区城址；长白县长白城址；沈阳市苏家屯区魏家楼子城址；灯塔县大河南城址；辽阳市区城址；辽阳县亮甲城址；凤城市刘家堡城址；丹东市绥河尖城址；朝鲜平安北道博川郡博陵城址；朝鲜平安南道顺川市慈母山城；平壤市大同江畔土城洞城址；平安南道龙岗市黄龙山城，朝鲜慈江道中江郡非古洞山城等。资料出处不一，不一注释。

- [12] 《汉书·贾邹枚路传》载：“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汉书卷·晁错传》载：“要害之处，通川之道……”
- [13] 同[10]。
- [14]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辽阳县[M]。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308。
- [15] 李文信：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J]。考古学报，1957（1）。
- [16] 王新增：辽宁抚顺莲花堡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64（6）。
- [17] 庞志国，宋玉彬：通化市拉拉屯北岗遗址[A]。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Z]。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 [18] 顾铭学，南昌龙：战国时期燕朝关系的再探讨[J]。社会科学战线，1990（1）。博川郡坛山里燕国村落遗址，出土有燕国半圆瓦当，铁器有斧、铍、掐刀等。
- [19] 《居延汉简》出土简牍 F. P. F22：69，见薛英群，等（注）：居延汉简释粹[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 [20] a. 萧景全：辽东地区燕秦汉长城障塞的考古学考察研究[J]。北方文物，2000（3）。
b. 抚顺县第三次文物普查成果分析[Z]。（内部资料）其他资料引自中国长城建筑与地理信息数据库分地区索引[Z]。辽宁省文物局提供，2012。
- [21] 王禹浪，王宏北：朝鲜境内大宁江长城东侧高句丽山城[A]。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C]。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288-289。
- [22] 朝鲜学者孙永钟先生在《关于大宁江长城的调查报告》中还说：“从今天平安北道地区的地形条件来看，在大宁江一线的前面，以鸭绿江东岸高丽千里长城一线为主，有不少地方可以设置长城、堵截城之类的防御设施。”见孙永钟（著），南宇明（译）：关于大宁江长城的调查报告[J]。博物馆研究，1990（4）。（原载《朝鲜考古研究》1987年第2号）
- [23] 2014年4~5月，通化师院李树林教授带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燕秦汉辽东长城田野考古调查”课题组，在阜新县八家子山北坡发现上、中、下三道总长约2.5千米的土筑长城墙堞，同时在八家子山3、4、5、6号山头新发现7墩烽燧址（有4处附筑4座方形戍营址）、在7号山头发现1座障候址；在阜新镇南山北坡发现长约2.5千米的土筑长城墙堞；在阜新县沙拉镇二郎山障城西北坡松树林中发现上、中、下三道并列土筑墙堞；在法库县叶茂台镇北山北坡发现长400余米的土筑长城墙体和1墩挖土破坏的烽燧，剖面黑土层中夹有红、黄色夹砂陶片，在土垣下耕地中还散布大量的红色夹砂陶片。同时在叶茂台镇西山、北山5座峰顶，新发现5处石筑烽燧并附有戍卒居住址，出土夹砂黄、红、灰素面陶片。首次证明这种土筑墙体与石筑烽燧当为战国（燕）始筑。在于寺镇小虎掌沟西山东、南坡亦发现上、中、下三道墙体堞壕。
- [24] 张松：辽宁法库数里“土棱儿”原是战国燕长城[N]。辽沈晚报，2012-6-26。报道北山北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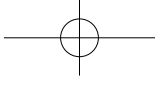


“石筑段”墙体残高 0.5 ~ 1 米。

- [25] 王秋义: 辽宁地域文化通览·阜新卷 [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3: 54.
- [26] 冯永谦, 赵振生, 等: 阜新地区北线长城调查经由纪实 [A]. 辽宁长城 (五) [Z]. 沈阳, 2006. (内部资料)
- [27] 同 [9].
- [28] 薛英群等 (注): 居延汉简释粹 [Z].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 [29] 吴承洛: 中国度量衡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65, 95.
- [30] 李树林: 汉辽东长城“郡县三城模式”与玄菟郡史治考析. (待刊)
- [31] 马扬: 吉林省白山市一座汉代古城浮出水面 [N]. 新华社, 2006-5-11.
- [32] 孙仁杰, 迟勇: 集安良民高句丽遗迹调查 [J]. 东北史地, 2004 (4). 典型夯筑平原城, 有护城河, 并附筑关墙, 当筑于西汉, 高句丽沿用。
- [33] a.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集安县文物志 [Z]. 1984: 61. (内部资料)
b.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集安市 [Z].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3: 117.
c.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集安市博物馆: 集安国内城东、南垣考古清理收获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2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 [34] a. 柳岚, 邵春华: 吉林通化市汉代自安山城调查与考证 [J]. 博物馆研究, 1991 (3).
b. 王志敏: 吉林省通化市治安山城调查报告 [J]. 北方文物, 2010 (3).
- [35] 王志敏: 高句丽故地与第二玄菟郡考 [J]. 东北史地, 2010 (5).
- [36] a.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通化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通化县文物管理所: 通化县赤柏松汉代古城 [A]. 中国考古年鉴 [Z].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169; 2012: 185.
b. 赵海龙: 2011 年吉林通化赤柏松汉代古城考古新发现——为我国汉代东北史地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J]. 中国文物报, 2012-4-27 (8) “文物考古周刊”.
- [37] [39] 徐家国: 辽宁新宾苏子河汉城调查 [J]. 社科通讯, 1983 (10).
- [38] a.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新宾县 [Z]. 西安: 地图出版社, 2009: 133.
b. 李新全, 李龙彬: 新宾县永陵汉代城址 [A].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6) [Z].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161-163.
c. 吕学明: 新宾县永陵汉代城址 [A].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5) [Z].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157-158.
- [40]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新抚区 [Z]. 西安: 地图出版社, 2009: 122.
- [41] 徐家国, 孙力: 辽宁抚顺高尔山城发掘简报 [J]. 辽海文物学刊, 1987 (2). 报告中指出: “在高尔山城西城西壁墙的瞭望台上, 我们曾从断壁上采集到西汉时期的陶片, 显然在当时已有与长城相关连的防御设施, 而为高句丽沿用重新修筑的”, 近年调查发现西城北端“将军峰”系一汉代烽墩, 见中国长城建筑与地理信息数据库分地区索引 (资料) [Z]. 沈阳: 辽宁省文物局, 2012.
- [42]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东洲区 [Z]. 西安: 地图出版社, 2009: 123.
- [43] a.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东陵区 [Z]. 西安: 地图出版社, 2009: 2.
b. 佺俊岩: 沈阳上伯官城址和墓葬的调查及其研究 [A]. 辽宁考古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3-197.



- [44] 李晓钟: 沈阳地区战国秦汉考古初步研究 [A]. 沈阳考古文集 (第1集)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24.
- [45] a.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沈阳市文物志 [Z].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3.
b. 刘长江: 沈阳宫后里遗址及相关发现 [A]. 辽宁省考古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57-65.
- [46]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通化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吉林省桦树河口遗址发掘报告 [J]. 北方文物, 2010 (4).
- [47] a. 金旭东, 安文荣, 杨立新: 探索高句丽早期遗存及起源 [Z]. 中国文物报, 2000-3-19. 其中三期、四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两汉。四期发现的环山围沟证实, 在西汉时期王八脖子是一个有较严密组织的大型村落。
b. 李树林, 李妍: 通化浑江流域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调查 [J]. 东北史地, 2012 (2). 文中认为此遗址在西汉时期是障亭性质, 所谓村落实际上是戍营址。
- [48] 李树林, 李妍: 通化浑江流域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调查 [J]. 东北史地, 2012 (2).
- [49] [50]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长白县 [Z].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3: 140-141.
- [51] 高林台城址, 见郭添刚, 王义: 阜新两座汉代城址调查 [A]. 辽宁考古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94-100.
- [52] 冯永谦, 赵振生, 等: 阜新境内南线燕长城调查经由纪实 [A]. 辽宁长城 (五) [C]. 沈阳, 2006. (内部资料)
- [53] 同 [9].
- [54] a.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丹东市 [Z]. 西安: 地图出版社, 2009: 165.
b. 王金波: 丹东市暖河尖汉城址的初步探索 [J]. 丹东史志, 1982 (2).
- [55]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丹东市 [Z]. 西安: 地图出版社, 2009: 166.
- [56] 冯永谦, 任鸿魁: 宽甸虎山获重大发现 [N]. 中国文物报, 1994-3-6. 我们推断汉代虎山城址性质当为障候。
- [57] a. 李树林, 李妍: 通化浑江流域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调查 [J]. 东北史地, 2012 (2).
b. 赵海龙, 等: 通化县秦汉长城资源调查 [A].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0) [Z].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197.
- [58] 冯永谦, 吉昌盛, 等: 沈抚地区汉代烽燧址考察纪要 [A]. 辽宁长城 (四) [Z]. 沈阳, 1998: 10. (内部资料)
- [59] 同 [9]. 2014年4~5月, 由通化师院李树林教授带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燕秦汉辽东长城田野考古调查”课题组, 在阜新县大巴镇北大山第2、3号山头发现3墩烽燧址, 在3号、4号山头障城南山脊上发现2段石筑墙体。
- [60] 同 [9].
- [61] 张福有, 孙仁杰, 迟勇: 良民: 高句丽的平壤城与国之东北大镇之新城 [A]. 古城沧桑 [C].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6.
- [62]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长白县 [Z].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3: 118.
- [63] a.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新宾县 [Z]. 西安: 地图出版社, 2009: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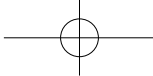


- b. 傅波: 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119-130, 99-106. (雅尔哈、代珉、扎喀关三关, 马尔墩寨) “从三关及近地出土遗物上看, 早在汉代就有关上山城了, 自高句丽至明代的遗物说明后金时期只是利用这三关而已。”
- [64]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战国秦汉长城遗址 [Z]. 西安: 地图出版社, 2009: 83-85.
- [65] a. 许志国: 辽北境内燕秦汉长城及相关遗迹遗物的发现和研究 [J]. 博物馆研究, 2007 (2).
b. 冯永谦: 东北燕秦汉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A]. 辽宁考古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81-82.
- [66] 同 [9].
- [67] 同 [20].
- [68] a. 冯永谦, 吉昌盛, 等: 沈抚地区汉代烽燧址考察纪要 [A]. 辽宁长城 (四) [Z]. 沈阳, 1998: 10. (内部资料)
b. 傅波: 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85.
c.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新宾县 [Z]. 西安: 地图出版社, 2009: 133.
- [69] 同 [48].
- [70]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浑江市 [Z].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3: 133-134.
- [71] 王成生: 从考古资料看西汉辽东等五郡郡治及都尉治的地望 [A]. 辽宁考古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369.
- [72] 王禹浪, 王宏北: 朝鲜境内大宁江长城东侧高句丽山城 [A]. 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 [C].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1994: 288-289.
- [73] 同 [63].
- [74]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通化市文物志 [Z]. 1987: 29. (内部资料)
- [75]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通化县文物志 [Z]. 1987: 65. (内部资料)
- [76] 张福有, 孙仁杰, 迟勇: 良民: 高句丽的平壤城与国之东北大镇之新城 [J]. 东北史地, 2004 (4).
- [77]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集安县文物志 [Z]. 1984: 61. (内部资料)
- [78] 冯永谦: 东北燕秦汉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 [A]. 辽宁考古文集 (二)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85-90.

A Study on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Great Wall in Liaodong of Yan, Qin and Han Dynasties

Li Shulin Jia Yunzhang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ircles home and abroad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Great Wall in Liaodong of Yan, Qin and Han Dynasties recorded in the historical data. Afte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the author confirm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Great Wall in Liaodong is neither a “column beacon tower” single structure nor a du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ruins and beacon tower”. It is a multiple barrier structure rich in connotation. It is composed of military facilities, which are the main part of the Great Wall,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kind to entities and auxiliary security ruins, i.e. “two plus one” building type; the three kinds of building structure of “dot-line type” barrier structure, “line” long wall structure and “segment” short wall structure are adop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ituations; there is a layout mode of “a basic, four kinds of combination and four special” system in space, thus forming a relatively complete scientific system of large linear defense barrier structure.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del of the early Great Wall of China.

